



我國政黨政治之蛻變及其對於

近代文化之影響

楊幼炯

一 緒言

我國近代文化之開展，導源於民權思潮之發動。數千年來我民族因地理上之制限，向來與世界隔絕，獨居東亞一隅，自謀發展，長久停滯於君主獨裁政治之下。其間雖有族長政治，封建政治及貴族政治之不同，然君主專制之歷史，直延綿達三千年之久。近代我國民權思想之勃興，實受西方民權思想與運動之影響。政黨政治者，立憲政治之產品也。立憲政治既以多數國民之意志為從違，則人人皆有參與政權之機會，即人人皆可要求其自己意見之實現，故政黨者，即國民各以政見，主義相結合，求實現其一定政見或主義之團體也。我國數千年來既行君主專制之政治，人民為政治之客體，而非政治之主體。歷來君主之傳統政策，以天下有道，庶人不議，箝人民之口舌；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窒人民之心思。其歷年數千而文化與政治未嘗有一新的開展者，實由於此。至

近代則以外來思想之刺激，本國民權運動之發展，各派政黨之樹立，使文化與政治造成一種空前新局面。政治與學術原相表裏，自來政治之良否，無不由於學術，故學術與政治，實有其密切之關係。

近代我國文化之啓蒙，始於西方文化之東漸。自歐亞航路發見，商人教徒，相繼東來，而西方文明藉此輸入我國。商人以負販為利，其影響於我國文化者尚小；而教徒以布道為業，往往以學術取信於人，對於東西文化接觸之關係殊大。西方科學思想之輸入，實以此為媒介。自鴉片戰爭以後，我國受列強之侵奪，積弱不振。一時士大夫咸主張輸入科學以求自強。惟當時所謂科學，僅指應用科學，甚至限於鎗礮、飛機、兵船，原不全指自然科學而言。其時輸入科學之動機，祇在利用科學之結果以求強，原偏於狹義一方面。至於此種科學輸入之後，對於人民生活，有何利益，既不為人所注意，自無更進一步認識輸入社會科學之重要。其後民智日開，一般知識階級既認提倡自然科學為富國利民之先務，并重

109875

109876

視社會科學之價值。彼輩以爲西洋之強，固不僅在武器之精，尤在其富力之雄大，與政治之昌明有以致之。於是政治革新之議，盪然而起，大部以西方政治學說爲背景，而以本國政治情勢爲骨幹。由清末之立憲運動，乃有初期政黨之形成。自中日戰爭之後，當時士大夫，鑒於日本以蕞爾小國，竟能戰勝大國，咸歸功於日本立憲之結果，深信專制國家，必難圖強，因之「頒布憲法」「召集國會」已成爲一般知識階級之願望。同時清廷受各方立憲者之恫嚇與壓迫，乃不得不有預備立憲之表示，中國政黨遂結胎於此時。三十年來我國政黨對於政治與文化方面，以最初及最近之影響爲最大，而在民國成立之十年中，各派政黨，化黨爲朋，則對於政治所種之惡因，固已罄竹難述。今試從三十年來我國政黨政治之演變，以見其對於近代文化之影響。

二 我國政黨政治之史的觀察

我國政黨政治之產生，實以最初之政治的祕密結社運動爲起點，其淵源則始自明末。當明代覆亡以後，志士仁人除有一部分著書立說，以宣傳民族思想外，更有一部分專在下級社會方面用工夫，祕密結社，以圖再舉，其中以三合會及哥老會在民間之勢力爲最大。其後三合會與哥老會，加入革命戰線，全國各省會黨，先後統一於興中會與同盟會，成爲最初革命政黨之基本勢力。與中會者，中國最初之革命團體也。由孫中山先生於一八九四年組織成立於檀香山，以「驅除韃虜，恢復中

華，創立合衆政府」(註一)爲志幟。及一九〇九年中國革命同盟會(簡稱中國同盟會)在孫先生領導下，組織成立於日本，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爲四大政綱，其黨員已徧布於海內外，卒已完成民主革命。在他方面與民主革命對峙者，爲君主立憲派，而以康有爲、梁啓超等之保皇黨爲肇始。君主立憲運動之發生，實導源於一八九八年(戊戌) 康有爲等所發動之變法維新運動，此種運動之中心主張，祇求於現政治之下，謀行政及教育制度之改革，並不企圖政治之根本改造。其所公表之「變法維新」方略，亦專思以清帝之威權行之。故自光緒中葉以至辛亥革命時止(一八九二——一九一一)實爲政黨之結胎時期，而以「革命」與「君憲」兩派之運動爲起點，政黨思想之發展，亦以民主革命與君主立憲爲主潮。民主革命運動之結果，爲清帝退位，民國成立。君主立憲運動之結果，爲戊戌政變，爲資政院，諮議局開會與清廷縮減開設國會之期限。民國政黨之醞釀與萌芽，既結胎於此時，而兩派於民國成立後之十年中，隱然成對峙之局勢。

至公開之政黨組織，則自前清資政院內民選議員組織憲友會始。清廷於一九〇六年(丙午)發布預備立憲之上諭，規定十年以後，實行立憲政治，設立資政院以爲中央議會之雛形，開設諮議局以爲地方議會之基礎。自是人民之希望立憲者，各立會社，接踵而起，一時要求立憲之運動，普遍內外。一九〇七年(丁未) 夏梁啓超、蔣智由等在日本東京組織政聞社，發布宣言，列舉四大政綱，其宗旨則完全爲欽命憲法

運動之政團也。次年卒於清廷禁令下解散。政聞社雖已消滅，而國內要求立憲之運動，並不為之少減。人民之要求立憲，請願召開國會者日多。一時憲政團體勃興，就中以「預備立憲公會」氣勢較為浩大，組織亦頗健全。此會由朱福銑、張謇等於一九〇六年組織，其地域以蘇、浙、閩三省為中心，而以根據清廷立憲上諭所宣示之旨趣，開發地方紳民之政治知識為目的。自其思想上之系統觀之，與當時康梁一派之保皇黨頗表深厚之同情，但表面上又力避與康梁之關係，故清廷未便予以壓迫。加以參加之社員，多為知名之士及實業界政界之聞人，聲勢頗盛。更結納廣東、湖北、湖南諸省之同情者，以為聲援，隱然為君主立憲運動中之「有力團體」。一九〇六年九月清廷以上諭頒布大綱，在各省設立諮議局，蓋代省議會而設立也。一九〇九年各省諮議局成立後一月，江蘇諮議局議長張謇，即以「外侮益劇，部臣失策，國勢日危，民不聊生，救亡要舉，惟在速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等語，通電各省諮議局，於是蘇、浙、皖、贛、湘、鄂、閩、粵、桂、魯、直、晉、奉、黑、吉等十六省諮議局各派代表三人，集於上海，組織「國會請願同志會」，並約定須俟國會正式成立，始行解散。經三次請願之結果，分裂為兩派：（一）為預備立憲公會認請願已有完滿結果，不再進行。（二）湘、鄂、川三省諮議局議長，堅持速開國會之議，謀再請願，遂與公會派分離，仍在北京繼續活動，卒致失敗。

109877
清末資政院之設立，可視為我國第一次立法機關，其性質本同於各國之國會，然因清廷當時設立之本意，僅在「取決公論，預立上下議

院基礎。」並未給以與國會相等之地位，原不過政府之諮詢機關而已。其組織採一院制，以欽選議員與民選議員聯合組織之。欽選多為皇族中人，素無政治經驗，缺乏憲政知識。反之，民選議員來自各省皆為各地諮議局之優秀分子，既幹練，復多聯絡，在院頗佔優勢。其後兩種議員漸有政團之形成，著名者有三：（一）憲友會，係當時之民黨，於一九一一年（辛亥）六月在北京成立，而以國會請願同志會為基礎。其重要之政綱為尊重君主立憲政體，促成責任內閣。入民國後，該黨之孫洪伊組北方共和統一黨，湯化龍林長民等組共和建設討論會，未幾兩者合併，更參以共和俱進會，共和促進會，國民新政社等團體，組民主黨。（二）憲政實進會，其所包含之分子，多為資政院中之欽選議員與民選議員中之碩學通儒，一類居多數。性質近於保守黨，民國成立後，此派即歸消滅。（三）辛亥俱樂部，世稱為資政院中之官僚黨，其組織欽選議員與民選議員皆有，其政綱注重闡揚立憲帝國之精神。

民國成立後，民主政治推行，促成政黨之發展，而新政黨之產生，如兩後春筍，葱葱林立。民元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各派因仿歐美共和先進國之例，紛紛組織政黨，即革命原動力之祕密結社的中國同盟會，亦於此時公開組織，後蛻變而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國民公黨合併為國民黨，於元年八月成立於北京。採兩黨對立主義，故其宣言中主張：「一國政黨之興也，祇宜兩黨對峙，不宜小羣分立。」因是對於政見之各小黨，取聯合主義，以期聯成一體，造成政治上之中心。此時

109878

之國民黨，其主張已不如同盟會時代，當時祇圖黨勢之擴張，不求主義之貫徹，甚至將以前之政綱，如國家社會主義，土地國有，男女平權等主張亦加拋棄。在他方面，反同盟會之諮議局派（即預備立憲公會）聯合各政團，合統一黨，共和黨民主黨等組進步黨，成為政府之與黨。故在國會開會初期，兩大黨對峙之形勢已成，彼時有民權黨（指國民黨）與國權黨（指進步黨）之稱。其時袁世凱當國，前者之用意，在與袁氏以總統之名，而取其內閣之實；後者則接近袁氏。故此兩黨無論從歷史的關係言，從利害言，從平日之態度言，均不能一致，其成為兩黨對立之局勢者，固為自然演進之趨勢。

自民國二年十一月至五年八月為政黨消滅時期，此時期起自國會停閉，至第二次國會重開，計時三年。先是自元年北京參議院開會至國會成立之期間，各小黨盛行併合，成為國民黨與共和黨之對峙，正式國會之成立後，又為國民與進步兩黨之對立。但因國民黨與共和黨或進步黨諸大黨中除中心分子外，均包含有多數之浮動分子，遂因環境變遷而生種種分合。自民國二年七月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就任正式大總統，積極發展其獨裁政治之企圖，首先設法消滅為國民黨所佔據之國會，同年十一月四日奪回國民黨議員之當選證書及徽章，國會隨即解散。國民黨既因袁忌而停止活動，在他方面進步黨又為獻媚於袁，不得不銷聲匿跡，且當時政黨為議員所獨占，各黨中均無非議員之黨員，國會停閉，國民黨解散中國政黨便入於消滅之時期。

自民國五年八月國會復活至民國十二年北伐之前夕止，此時期為小黨分立時期，亦即為中國政黨最腐敗，變黨為朋時期。其間各種形形色色之小派，或明或暗，活動於政海者不知多少，大別言之，自國會復活至黎元洪解散國會，其間約十個月中，初期以憲法商榷會與憲法研究會最佔優勢；末期有中和俱樂部之段派御用黨出現。迨黎元洪解散國會之後，演成張勳復辟之一幕，段祺瑞入京，理應恢復國會，乃聽信研究系之謬說，召集所謂臨時參議院，隨而產生安福國會，徐世昌總統與新新國會，同時南方亦成立軍政府，一部南下議員組織非常國會，隨而有廣州護法國會。在此南北兩國會中，北方政府下之政團，有安福俱樂部、研究系、討論系、交通系及新交通系等，南方政團則有政學會、益友社及民友社等。自民國九年直皖戰爭而後，安福俱樂部解散，同年八月舊國會復活，開會於北京，初次因一部分議員提議「國會祇議憲法，緩行其他職權」，故政團一時不能出現。其後以種種政治上關係，有形無形中，更發現不少之議員結合體，此時實為變黨為朋之最盛時期。大半以金錢勢力相結合，無一定之主張，故結果給國人以至壞之印象。其時小黨分立，渙散無常，又因逐黎問題，一部議員，分裂南下，而留在北京之議員，遂毀法，承認攝政，受賄，選舉曹錕為大總統，前此之政黨在爭權，此次議員，相率奪利，此為國會毀法賄選時期。

中國政黨之演進至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之改組，轉變而成新局勢。十餘年以來各政黨凡所作為，多偏於營私，往往有政團而無政綱，

僅有人的結合，而無主義上之結合，無裨於國家政治之改造。蓋軍閥政治一日不消滅，政黨徒爲軍閥之附庸，政治改造決無良好結果。故自民國十三年以後，各種政團多已無形消滅，而全注意於國民革命之進行，企圖於政治上求根本之改造。中國國民黨之改組即在勵行國民革命，樹立革命之中心勢力，造成我國政治上一新階段，謀根本上以三民主義爲中心，實行以黨建國與以黨治國。自是中國之政治路線，已全置於國民革命之進展中，而以建國大綱所定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爲逐漸改造政治之步驟，使政權統集於一個精密廣博的黨治之下。

三 政黨運動之分野與學術思想之革新

我國政黨演進之歷史，已如上述，今請進而論述三十餘年來政黨所及於學術思想之影響。我國晚近學術思想之發展，由於初期政黨運動之宣傳與行動，有以促成。與中會以至同盟會之革命運動，實足以給予我國民衆亦至大之民族的覺醒與民主的啓示；而保皇黨之專力於士大夫階級之文化的宣導，尤於我國文化之啓蒙，有莫大之影響。近代中國學術思想之啓蒙運動而言之，有三大淵源：第一，西方教士之東來布道，往往求以學術取信於人，使西方文化以此爲媒介而輸入。因之中外人士積極組織學社，以研討學理，刊行譯著。如一八八八年在中國之英美人士林樂知、丁隲良、慕維廉、艾約瑟，及李佳白等組織廣學會於上海，其所標示之目的，在謀啓發我國人民之思想，輔翊我國之自強，並

翻譯新書，發行雜誌，一時頗能見重於世；而其所刊布之書報，如泰西新史攬要、文學與國策、治國要務、自西徂東、列國變通興盛記、萬國公報等，皆能於我國思想啓蒙運動中，有不少之貢獻。而本國人士之譯譯西方名著如嚴復氏，更於我國學術影響甚大。嚴氏所譯之天演論（T. H. Huxley: *Evolution and Ethics*）出，思想界尤爲之一變。天演論發揮適者生存，弱肉強食之說，四方讀書之士，爭購此新著，又適當一八九六年「中東戰爭」之後，人人胸中咸抱一眇者不忘視跛者之觀念，因而益重視此書之價值。吾人若以近代我國之革新，始於一八九五年，則天演論者正溯此思想之源頭而注以活水者也。

其次對於我國文化之開展，最有巨大之影響者，則不能不推康梁之變法維新運動。康梁之學術中心，在提倡今文的公羊學，其思想固猶現今之所謂社會哲學。在中國學術思想上所貢獻者，在於發揚懷疑之精神與鼓勵創造之勇氣。是時清政不綱，屈於外侮，處國家積弱之餘，今文學派以通經致用爲揭櫫，而又與聞歐美之學術。知清室政治不良，不合於世界之進化，非改革不足以圖存，於是本其學說，援引歐美而爲變法之論。對於中國固有傳統的學術思想，更發生懷疑，在學術思想上起大變化。先是清末在滿清政府統治下之政治思想，原分二派：一爲文人派；以北京大學士翁同龢爲首領；一爲實力派，以天津之北洋大臣李鴻章爲首領。隸屬於翁派者悉爲都下名士，多崇拜中國固有之文物制度；隸屬於李派者，爲辦鐵路、輪船、電報、海軍等洋務人才，主張採用西洋軍

事交通制度，在其時前一派屬於守舊；後一派屬於維新。兩派在思想上，政權上，中日戰前，即有不少之暗潮。及中日戰後，維新運動起，兩派思想互變。李派屬於守舊，翁派屬於維新，而暗潮愈烈，卒以翁派得清光緒帝之助，及時論同情，李遂失政權而入居北京。自康有為入北京上書變法救亡，并設保國會，而翁派勢力大張，翁康互相利用，結託清帝，遂造成「戊戌變法」局面。康梁等維新派對於政治之主張，始終不外兩種基本之理論，即：（一）保種兼保滿族之說；（二）戴滿族為君，採用開明專制。然以當時排滿思想，彌漫宇內，民主革命已為全國人民多數之要求。康梁學說以前為我國近代學術思想之啓蒙運動的原動力者，今則已不足以激起一般人士之興奮，遂漸趨於消極矣。

在他方面民主革命之主張，易入一般人心，突飛前進，終觀辛亥革命之成功。同盟會時代對於學術思想之解放運動，進行更為猛烈。民報之刊行，使國人思想為之大變。胡漢民於民報出世之後，作民報六大主義一文，以闡明其使命，所謂六大使命者：（一）傾覆滿清政府；（二）建設共和政體；（三）土地國有；（四）維持世界真正之和平；（五）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連合；（六）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革新之事業。民報出版後，文字的革命宣傳與實際的革命運動，有相輔而行之效。而宋教仁所創辦之二十世紀之支那宣傳革命，亦極邁進。一時宣傳論著及雜誌刊行者尤夥。上海方面為我國交通孔道，西歐文化東漸，以此為中心，故能開風氣之先，而革命潮流之振盪亦烈。一九〇二年

上海志士章炳麟蔡元培黃宗仰（自號烏目山僧）等有中國教育會之組織，而吳敬恆等更創立愛國學社，以求國人思想上之解放，東南學界翕然宗之；同時復有蘇報為革命理論之宣傳，東南學界之革命思潮尤為激烈。故吾人若謂近代文化之開展，啓蒙運動導源於康梁之維新運動，而同盟會時代實為集學術思潮之大成者也。

本來近代中國文化之黎明，既始於清之季世，而中國同盟會與保皇會則為我國初期文化運動之左右兩翼。大抵清末之政治文化運動，以保皇會所倡導之「君主立憲論」為依歸，而民國開國以後之十數年中，又莫不受民主革命派學說之影響。故開國前兩派理論上之激戰，實給予近代中國學術思想以至大之啓示。革命與保皇兩黨之主張，原立於絕對之地位，而保皇黨更從而有阻撓革命之進行，其言足為革命宣傳之障礙，遂造成兩黨理論之爭辯。自一九〇二年康有為發布與南北美洲華商辦革命書遂成兩黨論戰之導火線，自康氏之書出，引起革命黨人猛烈之攻擊。兩黨理論之焦點，實可以代表初期政治運動左右兩翼之主張，歸納言之，可分兩項：（一）擁護與排滿之爭；（二）革命與開明專制之爭。康梁派以擁護滿洲政府為其中心之主張。康以滿洲種族出於夏禹，因倡滿漢一體，而難排滿之說。梁啓超於新民叢報著開明專制一文，反對共和立憲制，且謂排滿革命後之不能得共和，反以得專制。在同盟會方面堅持排除異人種滿人，建設漢族之共和政府，對於康梁「漢滿同一」之主張，力與嚴斥。章炳麟之駁康有為書論之最詳。

民報第一期汪精衛更著民族的國民一文，暢論民族主義，並力駁「漢滿同化」之說。就當時論戰之形勢觀之，保皇派不如革命派聲勢之浩大。蓋革命派以滿清政府之確鑿事實為根據，而主張推翻滿清政府之統治，實行民主革命為鵠的，甚合當時一般人民之心理，故易引起人民狂熱之信仰，而保皇派則處處掩護滿清政府之罪惡，而以改良現狀為主，且附會「漢滿同一」之說，為一般人士所難了解，卒無多大之發展。

此外社會黨對於我國學術思想之貢獻，亦值得吾人之注意。尤其在民國六、七年以後，中國文化運動之進展，尤有長足之表現。近代初期我國社會主義思潮之產生，一方由於時代環境所造成，他方又由於西洋思想之輸入。自嚴復氏譯天演論介紹進化論之思想外，尙譯有亞丹斯密之原富，甄克思之社會通詮，穆勒之名學及羣己權界論，孟德斯鳩之法意，耶芳斯之名學淺說，介紹西洋之經濟、社會、法律、政治、論理於我國學術界。對於近代社會思想之發展關係至巨。同時高陽李煜瀛氏更從法國方面輸入克魯泡特金之互助論，刊於新世紀，雖未刊完，影響亦大。惟在早期對於社會主義為系統之演述者，當首推孫中山先生。民國紀元前孫先生在日本發表之民生主義，申言民生主義即社會主義，而以平均地權、產業公有為實行民生主義之具體辦法。故其所主張之民生主義，實集各派社會主義之所長，為獨創的社會主義也。其次則在民國紀元前一年江亢虎所組織之社會主義宣傳會，發行一種社會主義之刊物明星報，入民國後即改為社會黨。至安那其主義在我國產

生亦早。李煜瀛、吳稚暉、張繼、劉師復等宣傳無政府主義，對於克魯泡特金、巴枯寧諸人學說，介紹頗多。民國紀元前六年頃，李煜瀛等在巴黎發行革命刊物一種名為新世紀，不僅提倡政治革命，並進而提倡社會革命。學理上以互助論為根據，并介紹盧梭與伏爾泰等反對強權，反對宗教之學說，紀約之自由道德論，及拉馬爾克、克魯泡特金諸人之著作，亦均在新世紀上發表。其時安那其主義者到處唱自由，唱互助，於我國社會思想上影響殊大。

中國社會主義之運動，盛於民國八年。自民國元年以至民國四、五年中，我國社會思想完全在一種僵凍之狀態中。所有政論及政黨之活動，與一般社會不發生多少關係。及民國六年，外受蘇俄社會革命之刺激，內受文學革命之影響，社會主義之思想與運動，乃勃然興起，鼓吹社會主義之刊物，亦如雨後春筍，各派社會主義團體林立。其最著者：(一)社會主義青年團（後改為中國共產黨）此派信仰馬克思學說，表明情於蘇俄，為中國共產黨之前身。社會主義青年團於民國八年成立，勞動組合書記部為中國實行勞動運動最早之組織，成立於民國九年，直至民國十一年共產黨始正式成立，在廣東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社會主義青年團以新青年、建設、嚮導、民國日報為其鼓吹機關。其後新青年發生分化，一派即陳獨秀等提倡社會主義，一派則為胡適之派，認定中國尙未具備需用社會主義之條件，兩派遂形分裂。惟此時青年團尙為研究學術之團體，而無實際之政治活動。後即改為共產黨。(二)基

109882 爾特社會主義派，此派發生於民國八、九年間，以張東蓀、郭夢良爲中堅，其言論初發表於解放與改造，繼在改造及時事新報附刊。張東蓀並會組織今人學會。羅素來華，似此派所主動，蓋欲藉以推翻馬克思學說，而

鼓吹基爾特社會主義也。民國九十年間，共產主義與基爾特派理論爭鬪，殊爲劇烈。至此派主張和平，對社會改革主漸進，不主急進，故與柯爾氣味相投也。章行嚴於民十一自歐返國，主張農村自治及農村定國之說，其說實本於英國潘梯（Penty）之農村基爾特社會主義，以「聯業」爲自治之基，與此派殊接近。惟此派之中堅人物多爲研究系，迨其本系在政治上失勢，且因潮流所趨，此派終歸消沈。（三）無政府主義派，此派在開國前祇有言論提倡，並無組織。民國元年至九年，先後有晦明學舍、心社、羣社、實社、無政府主義同志社、進化社等鼓吹安那其思想。民國九年以後，再組無政府主義同盟，日俄人士亦多加入。其宣傳刊物爲自由互助、自由人、幾勿提、學匯、春雷、鷄鳴、洞庭波等刊。此派思想多根據克魯泡特金、布魯東等之著作。自吳稚暉等專力於國民黨之政治改革後，此派久已停止活動。綜合言之，各派社會黨之宣傳與活動，實推進我國社會思想之動力。近代我國文化運動之初期，實以革命與君憲兩派爲之主潮，直至民國成立後之十年間，成爲對峙之形勢。自歐戰以後，我國社會主義思潮澎湃，各派社會黨樹立，使國人思想日益發展，而歸結於國民黨之三民主義。故三民主義者集各種社會思想之大成，而以其長足之發展，卒以奠定中國文化思想之礎石焉。

四 國民黨黨治之真義與文化建設之中心理論

就近代革命環境之需要論，我國政治之改革與革命政黨之中國國民黨實息息相關。即國民黨由與中會、同盟會、中華革命黨及改組後之中國國民黨，在組織上雖迭有變遷，但其始終一貫之主義與政策，實與近代中國之政治，有至密切之關係。換言之，國民黨勢力之消長，爲中國政治改進成功或失敗之關鍵。本來政黨與民治，互爲因果。有雄偉之政黨，然後始能實現民治，而政黨又須因民治而存在。雄偉政黨之要素，必須有主義，有組織，有訓練，並有多數之黨員，故實行推行民治之政黨，必須爲雄偉之政黨，否則便無成功之希望。我國近三十年之政治，在民主之孕育與創建途中，尤需有主義有歷史之革命集團，領導國民革命之羣衆的勢力。故國民黨對於近代中國之政治，實有其重大之使命。辛亥革命前，在與中會與同盟會時代，祕密結社雖多，然國民黨獨能以其一貫的主義與政綱屹然爲革命運動之中心，卒以完成「驅逐韃虜」「建立民國」之使命。民國成立後，政黨非常發達，大小政團，不下數十，然未幾即無形消滅，惟國民黨繼續發展，自推翻滿清，以至「討袁」「護法」「北伐」諸役，始終奮鬥，卒底於今日之成功，故其對於近代中國政治之貢獻，尤極偉大。

其次，國民黨就其性質言之，是一種革命的政黨，有別於普通之政

黨。普通所謂政黨之形式，祇是在國家權力之下，獲得相當之政權，憑藉現行法律上之選舉方法，以求實現其主張。而革命的政黨則異，是其絕對的權力，採取超出於現行法律之革命方法，以求達到革命之目的，實現其主張。故國民黨在國民革命成功以後，主張以一黨之力量，用非常手段，創造中華民國之施政方針，與根本組織。此與英國之自由黨，保守黨，美國之民主黨，共和黨，採用議會政策，在議會內鬪智爭雄，以求實現其主張者大相逕庭。故國民黨之黨治，實負有兩大責任，即「建國」與「治國」兩大任務。國民黨治之重要歷程有三，即（一）軍政時期為國民黨專負建國責任時期；（二）訓政時期為國民黨兼負建國與治國兩大責任時期；（三）憲政時期為國民黨以黨治國時期。此則國民黨逐漸改造中國政治之步驟也。

國民黨之三民主義，實為總理孫中山先生適應全體人類之需要而成之結晶，其目的在建設中國民族力求生存之最高意識。從科學之立場言之，實超脫一切時空之制限，而是以中外古今一切歷史的社會的事實作基礎。三民主義的文化建設，以人類爭生存為其重心。本來文化者，乃為人類生存之生活樣法，而求所以適應其環境之產物。人類要求滿足其生活，不得不求適應其環境，而文化即是人類適應於環境所創造，以滿足生活需要之工具。一民族，一時代，各有其民族之時代的文化，故文化常因其民族性之不同而產生各種之文化；又因時代之變更，而有各時代之文化。中國文化既有其悠久之歷史，與特殊之性質，在今

日日趨式微之中，就民族生存方面言之，實有加以保存之必要，惟必須重新估定其價值。三民主義的文化建設，完全着重在社會整個的民生問題。故孫先生之文化中心理論，即在說明「民生」為社會現象之基礎要因，且為社會變遷之根本動力。換言之，社會進化固隨民生之變遷而進化，即社會組織之形式，亦隨民生之狀態而決定。人類社會文化之進化，完全基於「生之要求」一點上。人類為要求維持其生存，不得不分向各方面求努力，其結果便形成民族的、政治的及經濟的種種關係，由此種種關係之推移，而社會更常有不斷之進化。故三民主義者即此生存方法與生存關係之總合的表現，而為民族生存之精神的與物質的基礎也。三民主義的文化建設主要的在振起民族精神。所謂民族精神，就一般的解釋，即是由有同一語言，同一種族，同一文化，同一宗教，同一習慣及同一歷史之人民集團發生而來之民族性。由此同一之民族性，始有統一之民族精神產生，而表現此種民族精神最顯著者，便是文化。中國文化有一種根本的一貫的民族之特徵，故能成為獨立之文化，因是而能在過去文化上為具體之顯現。惟在今日所需要之三民主義的文化，在如何可以維持我民族之生存。過去我國文化，注重人性之發揮與改進，即是心之改造，但處今日生存競爭之時代，僅注重內部之改造，猶為未足。必須從人與人之關係而產生之文化，進一步創造人與物的關係而產生之新文化。換言之，即是由靜的文化到動的文化，亦即是由內心的改造進而為外物之改造。比如儒家學說，可謂為中國民族精

109884

神之說明者。但吾人必須注重孔子「攘夷」之主張，提倡保衛宗邦之精神，闡揚儒家剛貞尚義持立獨行之修養，以奠立復興民族之精神的基礎。儒家慷慨任俠之精神，在儒行篇中尤有充分之表現。如所謂「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取。」「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此種皎然之氣節，正爲我民族性精華之所在，決不能與一般庸謹退縮之腐儒相提並論。故今後我國固有之文化，應加以新的估價與新的創造，使建立三民主義文化建設之中心，以求適合於我國民族今日之生存。

其次，三民主義的文化建設，又是以我國固有的道德作基礎。道德本在軌範個人之行爲，擴而充之，可以軌範民族之精神。吾人若能明瞭一民族固有之德性，即能徹底了解其民族性。東方民族所以有東方民族之樣法，西方民族所以有西方民族之樣法，無非由於兩大民族之道德性不同。我國固有之倫理思想，雖基於我民族之根性，但因社會組織之演化與時代思潮之推移，日久即發生種種之弱點。孫先生爲糾正已往倫理上之缺憾，特以「智」、「仁」、「勇」三達德爲倫理實驗之方法。所謂「智」是在別是非，因利害，識時勢，與知彼己。具體言之，「智」在以個人之意志，而決定其立身行事之方針，故「智」爲修己治人之

首要的達德。次爲「仁」儒家論「仁」祇是偏於玄想，關於「仁」之內容，尤無明晰之論斷，使人有虛無飄渺之感。孫先生則對於「仁」之內容，有具體之說明。即分「仁」爲「救世之仁」、「救人之仁」及「救國之仁」三種，而此三種性質，又都以博愛爲基，與儒家之偏於個人之仁者有別。孫先生所謂「仁」則完全以「救世」、「救國」爲目的。孫先生於倫理實驗方法，除「智」與「仁」外，尚須有勇氣以補其不足。故勇爲倫理實驗之要件。蓋吾人若祇知倫理之所爲，則必有勇氣去實驗，否則，仍爲懦夫，不能完成救人之大業。孫先生之所謂「勇」是「成仁取義，爲世界之大勇」，亦必須是「有主義，有目的，有識見」之勇。故勇必以長技能與明生死爲兩大要件。總括言之，三民主義之精神建設，以「智」、「仁」、「勇」之達德，爲倫理實現之基礎，但實踐又須以「誠」爲中心，所謂「誠」即是「擇善而固執之」之意。子思以爲學問、思、辯四者即擇善，而篤行，固執之意。吾人若以「擇善固執」之謂誠，作爲倫理之結論，實爲至當。用堅強之意志，決定終身以之之目的，人類求生存之基本力量在此，而國家安危，民族盛衰，尤以此爲準則。

(註一)見當時與中會醫辭。